

腹为五脏之总,故腹本喜暖。
——《老老恒言》

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 方锡球

明清徽州曾流传着这样一则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由于山地贫瘠,耕地稀少,经商成了那个时代徽州人生存下去的无奈选择。徽商多从小本经营起家,凭着“徽骆驼”的开拓进取精神,在明清商界艰难跋涉,在盐业、典当业、茶业、木料业、刻书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逐渐成为全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商帮。明代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徽商的成就,除了因为我们民族都有的开拓进取,坚韧顽强以外,还在于能够有自己的价值取舍。

在处理儒、商关系中生成求真务实的本领。徽商,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儒商。清代大学者戴震评价徽商说:“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士”即儒,戴震准确地指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儒者重义轻利,商人重利轻义,儒与商本来格格不入,然而在徽商身上,将两个对立的价值观,建构起新的“义利”观,将两种品质完美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在儒和贾之间,徽州商人面向现实求真,面向人生求实,“义”与“利”,在现实追求和人生品味的结合点上,演变成徽商的“求真务实”的能力。

在生存品质上以贾而好学、学而好贾为基本方式。徽州西递村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厅堂上有一副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好读书,是徽商得以驰骋明清商界的一个重要法宝。休宁人汪志德“虽寄迹于商,尤潜心学问无虚日。琴棋书画不离左右。尤熟于史鉴,凡言古今治乱得失,能历历如指诸掌”。黟县人胡际瑶经商时,“舟车往返,必载书篋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与庸俗市侩不类”。贾而好学提升了徽商



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地位,也改变了传统商人的形象,最后是提升了徽人的生存品质。

在职业道德上以诚信不欺为准则。经营布匹生意的歙县人吴南坡说:“人宁贸诈,我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绩溪人胡雪岩在“胡庆余堂”大厅里悬挂着一块“戒欺”的匾额,上面有一段胡雪岩亲起草的文字:“凡是贸易,均着不得一个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诚信不欺是徽商经营的信条,也成就了徽商事业的辉煌。

在社会担当上以兼济天下为情怀。箬岭是横亘在宣州和歙县之间的一座大山,蜿蜒四十多里,为歙县、休宁、太平、旌德外出的要道。青壮年过山都要休息百十次,其他人之艰难更不用说。为了山里人出行方便,徽商程国光捐资雇工,剃莽凿石,铲峰填壑,上下修路上百里。歙县的石材不够坚硬,他就从浙江运来坚硬的巨石,用于架桥铺路。他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终于完成了修路的夙愿。兼济天下是徽商的美好品格,也形成了徽商的优良传统。

总之,徽商之所以被称为“儒商”,是因为徽商植根于程朱阙里,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贾而好学”、诚信不欺、兼济天下的儒商精神使徽商在明清“士”文化的背景下,不仅赢得了广阔的商品市场,而且赢得了其他商帮无法比拟的身份认同。

现代学者胡适先生说:“我将来如有工夫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徽商文化,是流淌在徽州人心底的美好记忆。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最为厚重的底色之一,也是安徽文化的鲜明符号之一。

徽商精神之我见

□ 范伟军

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徽商曾纵横明、清两代300多年,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徽商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绝非偶然,其在经商处世中形成的精神价值是内在支撑和根本原因。关于徽商精神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以为,就其本质内涵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崇文。儒商是徽商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商帮的显著特色。徽州被誉为“程朱阙里”、“理学之邦”、“东南邹鲁”。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徽商自幼接受儒学教育,经商之前大都知晓诗书,有的本身甚至还是理学鸿儒、文化大家等。“贾而好儒”成为徽商能够迅速崛起的内在决定因素。人文素质较高的徽商在发迹后尤其重视教育文化,往往回乡捐资助学、振文兴教,这也使古徽州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状元进士最多的地方之一,有力地促进了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二是开放。开放是徽商发展壮大的应然选择。徽州是“道路梗阻,交通乏便”之地。为了生计,许多徽州人往往“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少小离家,四处闯荡,经商谋生,足迹遍及海内外。据康熙《休宁县志》卷一记载,徽商“走吴、越、楚、蜀、粤、燕、齐之郊,甚至遼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宇内。”凭借这种强烈的开放意识,徽商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占领全国的市场,创造出“无徽不成镇”的广阔事业天地。

三是诚信。诚实守信是徽商始终不渝的经营理念。徽商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中大获成功,靠的就是“诚信”。徽商十分注重商业道德,在经营活动中“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讲求以义为先、重义轻利,重承诺、崇信誉。胡庆余堂的“戒欺”匾额、胡开文“毁墨于一池”,都是徽商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规范的真实写照。

四是进取。进取是徽商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有人把徽商形象地比喻为“徽骆驼”和“绩溪牛”,正体现了徽商身上具有的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虽是小本起家,但他们行商不怕挫折、顽强执着,如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未厌焉”。徽商之所以能够雄起阡陌、做大做强、名振四方,正得益于这种勤恳务实、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

五是创新。创新是徽商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广阔的经营范围内,徽商敢为人先,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有经营方式的创新,如他们突破地域限制,顺江而下,采取长途贩运的经营方式;有经营品种的创新,如由经营传统的竹木、典当业转向茶业、盐业,获得了更高的商业利润;有资本经营方式的创新,如创造性地实施多种资本经营方式,包括贷本经营、委托资本经营等。更为难得的是,在生产工艺革新方面,徽商也做过有益的尝试。如,清代茶商胡元龙改制红茶,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拓宽了产品的销售渠道。

六是和协。和协是徽商秉持的商业价值观。徽商有“和商”之美誉,既讲究“内协”,也注重“外和”。“内协”,是指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徽商的家人、族人或者商业团体之间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能够抱团取暖、同舟共济。他们往往还通过遍及全国各地的会馆、商会,建立起广泛而紧密的商业网络,做到以众帮众、相互扶植。“外和”,是指徽商秉持“和气生财”的理念,重视与社会各方面的友好相处,为自身营造和谐的经商环境。

从明代徽派坊刻经营看徽商精神

□ 樊嘉禄

徽商精神的内涵极其丰富,这里仅从明代徽派坊刻业发展这一视角作浅显分析。

徽州刻书业可以追溯到北宋甚至更早,南宋时有比较突出的成就,但直到明代初期,均一直延续官刻和家刻两个系统,刻书不为赢利,意在传世留名。当然,由于校勘精湛,不计成本,留下了不少精善本。

徽州刻书业的辉煌时期在明代,尤其是在明隆庆、万历时期,一批徽商和士宦的介入使坊刻骤兴。徽州人不仅在本府境内建立刻坊,更走出乡邦,在寓居地南京、杭州、苏州、扬州等重要的出版城市占领图书市场,形成了庞大的徽派坊刻网络。分析徽派坊刻业成功的原因,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徽商的经营之道。

首先,依靠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选择一般坊刻商无力完成的大部头著作,如正史、丛书、类书、文集等作为自己的主营业务,通过市场细分,迅速占领市场。

其次,通过集团作战,与徽州同乡的通力协作来大大缩短出版周期,及时供应市场,进一步扩大竞争优势。如万历年间吴勉学学校刻《资治通鉴》294卷,附《释文辨误》12卷,装帧达100册,就是合作的典范。

第三,重视质量,精益求精。最根本的保障是培养了一批一流的技术人员。当时徽州刻书业遍地开花,真正达到“家传户习”、“村墟刻鏤”的程度。其中虬村黄姓一族最为突出,有“徽刻之精在于黄,黄刻之

精在于画”之说。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绩溪人胡宗宪在任职地杭州组织刻印《筹海图编》,用的是家乡徽州的黄姓刻工。一流的刻工队伍加上一流的管理,徽派刻本具有版本善、校勘精、印制好的特点,与同时代其它坊刻本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紧扣时代脉搏,掌握消费者需求。徽派坊刻商根据市场动态,选择当时流行的戏曲、小说和实用书等品种,特别是配以精湛的插图,广受读者欢迎。

第五,注重技术创新。最值得一提的是徽州版画雕印技艺。它脱胎于徽州刻书技艺,又代表着徽州刻书技艺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徽州聚集了丁云鹏、吴左千、郑重、汪耕等著名画家,为版画创作提供有力支撑。徽州版画以线描为主要表现手法,构图饱满,少有空白,追求诗情画意。既有名家画稿,又有精细刻工,绘镌双绝,相得益彰。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数以短版印刷工艺为代表的彩印技艺的发展与成熟。

从明代徽州版刻技艺蓬勃发展的这一局部就反映出徽商精神中的一些方面,如敏锐的洞察力、合作意识、精益求精的质量意识,还有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和协同创新精神等。这些当然只是徽商精神内涵的一小部分,但可以解释徽商称雄商界的奇迹发生的内在原因,对于当代徽商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